

以色列「國父」本－古里安

高秋福

以色列的國際環境得到改善，國內矛盾卻日益凸顯。執政黨內部矛盾錯綜複雜，反對黨力量日益強大。本－古里安感到內外兩面受敵，遂將阿巴·埃班、摩西·達揚、西蒙·佩雷斯等信得過的年輕一代人提拔到國家領導崗位。一九六三年六月，他再次辭職，又回到薩德博克。

長眠大漠深處

承蒙以色列新聞局的安排，我訪問了薩德博克。那是內蓋夫沙漠深處一個很小的村落。四周是漫漫黃沙，遠處有乾涸的河道和崎嶇的峽谷。離開村莊不遠的地方有一個靜謐的小院，院中有幾棵橄欖樹，還有兩幢低矮而簡陋的木板房，這就是本－古里安當年安身的地方。據介紹，基布茲本計劃為他修建一座像樣的房舍，但他堅決拒絕。現在的兩幢房舍，一幢供警衛和服務人員居住，另一幢則是他和夫人的寓所，包括臥室、廚房和書房。所有這些房間都顯得極為逼仄，但很整潔。給人印象最深的是書房，其中擺滿藏書，據說有五千冊之多。就是在這裏，他邊讀書邊寫作，不但完成了具有重大歷史價值的多卷回憶錄，還為內蓋夫謀劃了長遠的發展藍圖。作為「藍圖的基礎之筆」，他推動在基布茲附近修建了薩德博克學園。學園中不但建立有幾所學校，還逐漸建立起近二十個研究機構和文化設施。其中，不但有適應內蓋夫開發所特需的沙漠研究所、太陽能研究中心、無土栽培研究中心，還有沙漠雕塑藝術館、民族遺產博物館、歷史檔案館。他既看重實用科技的研發，也看重具有獻身精神和創造能力的人才培養。

遺憾的是，內蓋夫地區的開發，並未達到本－古里安預想的目標。因此，他死不瞑目，生前早就同夫人保拉商定，身後安葬在內蓋夫，希望總

有一天能看到自己的理想變為現實。他們的墓地選擇在離沙漠研究所不遠的地方。那是一片空曠的沙石地，近有濟恩河乾涸的河床，遠是起伏的沙丘和山岩。一九六八年一月，保拉先去世。本－古里安親自選擇石料，為她製作了一口石棺。近六年後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一日，他自己因腦溢血逝世，終年八十七歲。根據以色列政府的安排，全國為他鳴笛致哀，遺體安放在耶路撒冷的國會大廈供人瞻仰。他的遺體本可以安葬在耶路撒冷的國家公墓，但他留有遺言，要永遠與妻子為伴，與內蓋夫為伴。因此，其遺體只好運到薩德博克，安葬在保拉墓旁。也是應他生前的要求，葬禮從簡，只有少數親朋好友前來道別。他們只是俯首默哀，不發表任何悼詞。他生前一再說，默哀比任何頌詞都更有分量。

我走過一條不太長的沙石小路，默默來到本－古里安夫婦的墓地。只見灰白色的沙石地上，並排擺着兩具白色的石棺，上面鐫刻着他們的姓名和生卒日期。在這些文字之旁，散亂地擺着一些小石塊，顯然是追悼者以石代花奉獻的祭品。石棺四周除了幾株綠葉婆婆的桉樹，沒有任何東西安放。據說，有人曾提出在石棺前豎立墓碑，但憶及他不發表任何悼詞的囑託，終於作罷。其實，任何墓碑恐怕都不如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更為高大。

我腳步輕輕地繞着石棺走了兩圈，生怕攪擾他們夫婦的安睡。這時，我忽然想起他的密友之一伯爾·卡茲內爾森所說的話：本－古里安是歷史贈給以色列的一件非凡的禮品。在他身上，勇氣和毅力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他是現代猶太歷史上的英雄，永遠活在猶太人的心中。我認為，這不只是一個朋友對他的評價，恐怕也道出了衆多猶太人的心聲。我一邊這樣想着，一邊也仿效以色列人的做法，隨手從地上撿起幾塊白色的小石頭，默默地擺放在他和夫人的石棺上，祝禱他們永遠安息。（下）



▲本－古里安夫婦墓地

作者供圖

初見香港

王樂

已經記不清究竟是多少年前了，青澀未退仍處學生時代的我，初次來到香港。那是我與這東方之珠的首次相逢，凌晨十二點左右到達的飛機，計程車穿過了離島區與小半個港島，無人接收的學生公寓，貴到吃驚的旅館單人間……記憶裏的點滴只剩下模糊的片段，但我仍記得那午夜凌晨的初相見，只剩下全天候營業的麥當勞能供我短暫休息。

整條街道已然昏睡過去，偶爾能看見一兩輛車開過的燈光，隔壁的7-11燈光仍亮但聲音寥寥。麥當勞門邊坐兩位拄拐杖，步履蹣跚的老爺爺，套灰白的舊式夾克，面前兩杯咖啡，正在與一位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人交談，偶爾一兩句聲音傳來，大約能辨識出粵語，只有語氣易識，平靜和緩。我剛坐下時，便進來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士坐在我的旁邊，紮一束馬尾，套簡單的針織衫，眉目清秀，她在昏暗的燈光下讀一本書，不時發出絮語。我看她，她也親切地報以一笑。門邊的老爺爺與青年人互相道別着走了，喧囂一陣又回歸寂靜，有人進來點一份餐，坐下吃完又悄無聲息地出去。

大約凌晨三點的時候，我昏昏欲睡地望着街燈發呆，坐着旁邊的女士突然發聲：「你有聞見街角的味道嗎？」我怔了一下，「啊？」她再次問我：「你有聞見街角的味道嗎？我感覺是有人在這着塑膠。」我非常努力地嗅了嗅，卻只能遺憾地

告訴她：「我好像沒有聞見。」這個奇怪的話題打破壁壘。從為什麼深夜坐在麥當勞讀書開始，談到香港這座城市，她指着我身後的高樓說：「觀龍樓，是這裏最大的居屋啦。香港大小，好多人都在等住房，搖號好難等的，只好住遠的地方。」我借着微亮的光向窗外望去，身後的高樓還沒能看見頂層，北京很少有這樣的高樓，在坡度驚人的山地地區更是顯眼地像一柄鐵劍。我對香港這座城市懵懵懂懂，不知道香港有多少這樣的高樓，也不知道這樣的高樓裏面可以容納多少的住戶。只是地狹人稠的香港，土地和住房似乎永遠是政府、民衆和市場爭奪的焦點。我會蹣跚的粵語，她會蹣跚的普通話，以及彼此都會的似乎都不那麼流利的英文，有時沒法說清的時候，她會拿出紙巾寫下幾個字，涉及到敏感話題時，她會將紙巾撕成一團扔在盤裏。天色漸漸亮了起來，她看一看手表說：「我要先走啦，今天要去見我的父母。歡迎來香港！」

這是我在香港遇見的第一個真正交談的人，在深夜的麥當勞，她看一本書，我等着天亮，或深或淺漫不經心地交流着。但在那以後，我再也沒有遇見過她，即使之後我也曾經因為複習功課在麥當勞久坐至深夜。也沒有在遇到過一個似她那般健談的香港女士。

城市的高樓大廈裏，香港的水泥森林裏，有太多太多匆匆擦肩的行人，也有不少各懷理由獨坐麥當勞等天光的路人，但一個微笑，一段淺談，或許就能令這座看似冰冷的都市，添上幾分人情上的溫暖。

春風吹又生

小冰



美國散記

加州每年都有火災，「失控」、「救援困難」、「繼續蔓延」之類的描述反覆地說。這次的La Tuna山火我們碰上了，眼見為實。

汽車一駛近Burbank市區，就看見幾公里外的群山中濃煙滾滾，直衝雲霄。濃煙下，一條長長的金黃色火焰，腰帶似的纏在山間，把群山切割成上中下三個部分，上面和下面未着火，火焰在中間燃燒，往兩邊蔓延，長達數公里。還好，雖然大山整個把市區圍了個圈兒，卻夠遠，不會對市區構成威脅。

「怎麼沒人救火？」我問身邊人。「一定有人在救！不過你看那陣勢，怎麼救？談何容易！」答曰。這樣的山火是很難救的，人在現場，感官有別於看電視，兇猛的La Tuna讓我感到，人的能力實在有限，什麼電腦，什麼人工智能，在大自然面前一點用場都排不上。

九月初四那天，洛杉磯郊外燃起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山火。新聞一播出，在成都的小妹妹同學周女士情緒激動，立刻打開同學群，關心洛杉磯的同學們。

加州的山火每年都要燒，每年都因天氣炎熱所致。今年是洛杉磯幾十年來最熱的一年。八月三十日那天，洛杉磯氣象局說，當天溫度為華氏一百零一度（攝氏三十八點三度）。八月三十一日那天，有居民錄得華氏一百零七度（約攝氏四十二度）。那兩天真是好熱好熱，陽光下很難呆上十分鐘。

英國紙幣上的女作家

阮阮



自由談

英國是適合小住的，看看那日不落帝國的文化遺產，品品這保留至今的紳士品格，典雅而自在。可一旦久住，人就難免會變得似倫敦的天氣一般，雲霧繚繞，再好的心情也總像是有層陰霾籠罩一般。我想，這大概就是英國作家大多擅長書寫悲劇的原因吧。

這種天氣和氛圍裏，人是容易多愁善感且懷念過往的，好比之前哈利波特面世二十周年，又好比幾天前，英國人在剛剛發行的新版十元英鎊鈔票上印上了女作家簡·奧斯汀（Jane Austen）的頭像和名句。

是的呢，今年是這位多愁善感的女作家逝世200周年的紀念年呢！但在英國這樣一個崇尚精英主義的社會裏，能替換掉狄更斯出現在紙幣上，簡·奧斯汀算是英國女作家裏的第一人了。而英格蘭銀行公布這一消息的地點也正是簡·奧斯汀的長眠之地——溫徹斯特教堂。

印在紙幣上的那句名言，正是出自簡·奧斯汀著名小說《傲慢與偏見》中的那一句：「I declare after all there is no enjoyment like reading.」（我敢肯定，沒有什麼事情比讀書更令人愉悅。）

說起簡·奧斯汀，中國的讀者一定都不陌生，她生於英國，是一位牧師的女兒，因為終身未婚，曾被人質疑過其性取向的特殊性。在自家的客廳裏，簡一邊料理家事，一邊寫小說，總共留下了六部長篇小說，《傲慢與偏見》、《理智與情感》和《諾桑覺寺》是早期的三部，而《曼斯菲爾德莊園》、《愛瑪》、《勸導》則是後期的三部。

作為簡·奧斯汀的代表作，《傲慢與偏見》的影響力顯然蔓延至全世界，在中國大概小小年紀的少年都能對這部作品說上一二。初讀《傲慢與偏見》時，讀者自然會把男女主角和書名中的兩個詞對應起來：Darcy-pride，Lizzy-prejudice。二讀則不難發現，Lizzy才是更pride的那個，Darcy更大程度上要克服的是桎梏於本階層的prejudice。走到人生的這個階段再返身去看，pride和

prejudice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而我們每個人自出生就帶着這枚硬幣，就像寶玉銜玉而生，我們所來自的家庭、教養、教育等一系列都宿命地刻畫了我們的pride和prejudice。而這個故事最動人的地方就在於，愛，使兩個人克服了自身的種種局限，不論是傲慢的還是偏見的，最終在愛裏，兩個人真正地找到自己也成為了更加真實的自己。

年初的時候，曾陪同從國內來訪的朋友一起參觀了位於巴斯（Bath）的簡·奧斯汀中心，那是在巴斯的幾處故居之一。門口站着打扮成喬治時代紳士模樣的人，抵着嘴和前來參觀的姑娘們合影。進入裏面，不大的居所被分成內外兩個部分，外面是一些簡單的介紹和紀念品商店，以及等待室。講解員會從內室出來，送走前一批遊客，再把新的一批請入室內，然後站在焚墓前像做Presentation一樣為大家介紹簡·奧斯汀的生



▲九月開始英國發行印有簡·奧斯汀頭像的新版十元紙幣

作者供圖



▲今年七月十八日是簡·奧斯汀逝世兩百周年的紀念日

作者供圖

▲英國巴斯的簡·奧斯汀中心

作者供圖

平故事。

簡·奧斯汀不像勃朗特姐妹，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牧師公館裏寫作。她隨着父兄工作的變動四處遷徙，在英國各地都留下了足跡。在巴斯的四年多時光裏，她的創作陷入低谷，沒有完成一部小說，或許是巴斯頻繁的社交生活擾亂了這位女作家的心神，這期間她還遭遇了父親離世的打擊。看上去，這座有着古羅馬浴場的旅遊城市成為了簡·奧斯汀的傷心之地。儘管如此，在離開巴斯之後，簡·奧斯汀還是在《諾桑覺寺》和《勸導》裏都提到了它，並且在她筆下，巴斯是一個讓人快樂的地方。除此之外，在英國國家人像美術館一個不起眼的玻璃展櫃內，也留有簡·奧斯汀存世不多的影像資料。

儘管英國曾有着輝煌的日不落帝國史，但英國人在音樂上的成就不及德國、奧地利，在美術上輸給了法國、意大利，連食物也敗給了全世界，唯獨在文學領域上，英國算得上群星閃爍。從簡·奧斯汀成為了英鎊上的首位女作家一事上就不難看出，兩百年過去，英國人對這位女作家的喜愛有增無減。

去年，英國曾大張旗鼓地紀念了莎士比亞逝世四百周年，如今又迎來了簡·奧斯汀逝世兩百周年。一個國家對自身文化的自豪與推崇，我想，大約莫過於此了吧。

余靖

月餅裏看南北方



飲食男女

秋風漸起，天氣微涼，再過不久就要到中秋節了，市面上的各式月餅開始粉墨登場了。但說起這月餅，南北方的口味差異可是大小呢。

那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事情了，我欣喜地收到錄取通知書，離開了南方老家，到北京來上學。那時學校過中秋的時候還是會發月餅的，那年開學不久後，我就趕上了。可是從學校食堂出來，我手裏拿着一個硬邦邦的棗泥月餅卻無從下口。我問同宿舍的女孩：「為什麼月餅會這麼硬呢？」「怎麼會有軟的月餅呢？」這位來自秦皇島同學一臉的疑惑。

我不知該作何應答，這才知道原來北方的月餅跟我們南方，截然不同。只記得那一刻，我手裏攥着圓形的板磚，心裏惦記着南方的父母，結結實實地體會了一把李清照的「未語淚先流」。

後來與學校裏的同學們熟絡了起來，漸漸地也習慣了這北方硬邦邦的五仁月餅，如今倒

也見怪不怪了。只是偶爾也懷念在南方吃的廣式和蘇式的月餅，小時候也不覺得是好東西，吃一點兒嗓子眼裏就發膩，一到北方反而成了稀罕物。

我最吃不膩的就是鮮肉月餅，幾年前，在和平里的和平商業大廈賣過鮮肉月餅，後來可能因為不合北方人的口味，生意不好，就撤了。再後來，北京市面上推出各式新型月餅，如哈根達斯的霜淇淋月餅和德芙的巧克力月餅。



▲鮮肉月餅在江浙滬一帶受喜愛

資料圖片

直到近兩年，鮮肉月餅才慢慢在京城的部分食品超市出現。

記得有一年，我先生在中秋前夕去上海出差。我囑咐他給我買鮮肉月餅。我先生回京當天一大早趕去上海南京路的一家老字號排隊給我買了月餅，然後直接去虹橋機場。飛了兩小時後到達北京首都機場，從機場打車到機場高速公路出口附近的寫字樓給我送月餅。月餅到我手裏時還是熱烘烘的，我先生的這份心意也算是我這幾年最美好的記憶之一了。

鮮肉月餅是蘇式的，內餡外頭包有酥皮，講究現烤現賣現吃。吃時一手拿餅，一手在下巴處托着，免得外層酥皮往下掉。月餅烤製時，肉餡的油分和肉汁一層層地滲透到外頭的酥皮中。燙手的酥皮透過包裝紙散發出的那份鮮香，比西點舖的拿破侖強上百倍。對於家鄉的思念，除了父母，住住都會落實到家鄉特有的美食，也難怪各大文人總會在散文中翻來覆去地介紹家鄉菜，那大約都帶着不少情懷吧。這月餅，吃的是個節日的氣氛，也是南北方的異鄉客對家鄉的思念。